

馴服 v.s. 抗拒：
中國政治權力控制下的新聞專業抗爭策略*

王毓莉**

投稿日期：100年3月22日；通過日期：100年8月23日。

* 本文的完成，感謝助理林志遠、蔡瑋玲同學的協助。更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給予寶貴意見，使得本文更加完善。

** 作者王毓莉為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e-mail: ylwang1022@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主要援用 James C. Scott，佐以 Michel Foucault，對於「權力」與「反抗」的論述，並透過深度訪談法與文獻分析法，探討中國大陸新聞工作者從事新聞產製時的馴服與抗拒策略。研究發現，中國大陸新聞組織與管理機構當中，存在著接近圓形監獄的機制，新聞媒體管理階層，同時扮演著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雙重角色。新聞工作者透過時空轉換、責任轉移、報導事實、合縱連橫、反客為主、鑽研漏洞等隱藏文本的抗爭策略，期望爭取更大的新聞專業表現空間。

關鍵字：抗拒、政治權力、新聞專業主義、隱藏文本

壹、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古典權力觀，總將權力視為少數資源，集中在某些特定人士手中，帶有上對下的對抗權力意涵（李猛，1999）。而這樣的論述邏輯，往往只是將媒體老闆視為組織內最大、甚至是唯一會影響新聞工作自主權力的擁有者，新聞工作者則是被宰制的一方（Murdock, 1982）。過去對於中國大陸新聞自由的探討，也大都流於「民主」與「不民主」、「自由」與「不自由」的二元對立論述。

張文強（2002），認為上述的古典權力觀，不能完全解釋權力的運作，因而針對台灣媒體組織中權力運作，探討新聞工作自主問題。以古典權力觀為基礎的新聞專業論述，在處理組織內部權力問題時，似乎於無形間簡化了權力本質。在真實情境中，權力源自組織不同層面，細膩且多樣性地發揮影響，且新聞工作者亦能展出相對應的權力抗拒策略。

中國社會結構隨著改革開放演變，伴隨著政治領域權力的減弱，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權力正在逐步成長，原先政治領域壟斷一切權力的單級結構，正在向三個領域分享權力的多級結構轉變，造成社會自由空間的出現和不斷擴大（田中初，2005）。

中國大陸新聞改革的發展在此情境下展開，不管是陳韜文提出的「媒介的鐘擺現象」（media oscillation; Chan, 1995），陳懷林與陳韜文（1998）認為中國大陸所擁有的是「鳥籠裡的中國新聞自由」，或是王毓莉（2010）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自由」等論述，都說明了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度正在有限度的範圍內，做不同程度的推進。特別是在新聞輿論監督的表現上，出現了一些改革派媒體，即便在中國高度政治權力控制下的新聞環境中，這些具有新聞專業主義認知的新聞媒體，

仍然能夠有所作為。

張裕亮（2005）指出，中國大陸的報業，正從黨國化，走向商業化、分權化、與集團化。賴祥蔚（2002）進一步提出，中國的一些具有市場化報業，在不公然挑戰黨國禁忌前提下，善加運用制度因素的變化，尋求有力的嘗試性創新突破，也從而弱化了政權的控制。王毓莉（2009）從分析中國大陸《南方周末》的文本中發現，《南方周末》的內容藉由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中，採取「多重消息來源」、「事實標準」、「安全選題」、以及「避免究責」等避禍策略，企圖突圍官方政治控制，而在跨地區的監督直接程度與監督具體對象方面，都有更直接批評的語徑表現。

陸曄與潘忠黨（2002）則認為，中國大陸新聞從業者建構專業主義話語的歷史場景，面臨黨對媒體的控制、市場對媒體的誘惑和支配、以及專業服務意識對媒體自主的壓力。由於不同的傳統和推拉力量通過這些機制約束、促成、選擇並固化各種不同的新聞實踐，專業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實踐中，必然出現碎片和局域的呈現。

而從新聞實務界中，若干較市場化的媒體案例，可以一窺中國大陸實務界對於專業主義的追求。財經雜誌總編輯胡舒立，自從創辦財經十餘年來，尖銳地挑戰了中國言論自由的邊界，當其他頑強的中國記者被拘捕或噤聲很久之後，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編的位置上，一直到 2009 年才與新聞部多位高層，以與幕後股東因理念不合為由，陸續離職（連雋偉，2009 年 11 月 10 日；Osnos, 2009, July 20 / 方可成譯，2009 年 8 月 1 日）。而廣州的南方報業集團中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屢屢衝撞體制，時常以「出格」方式從事新聞報導。

過去針對中國相對較市場化的新聞媒體產製相關研究，側重在針對特殊媒體的新聞個案進行敘事文本或內容分析的考察（武婧，2006；姜

紅、許超眾，2008；孫旭培，2001年12月18日；高菲，2006；喬雲霞、胡連利、王俊傑，2002年10月18日）。然而，這樣的論述，不足以解釋現階段發生在中國大陸新聞產製端的種種現象。

本文主要期望援用耶魯大學教授 James C. Scott，佐以法國大學思想史首席教授 Michel Foucault，對於「權力」（power）與「反抗」（resistance）的論述，發展出研究架構。並透過深度訪談法與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對象包括一向被認為改革派的南方報業集團內不同媒體的新聞工作者，以及透過中國大陸新聞學者的解讀，期望更全面性與深入的瞭解改革派傳媒，在面對中國高度國家權力控制下，新聞傳媒在從事新聞報導產製時，新聞主管與工作者，在馴服與抗拒的過程中，發展出怎樣的隱藏式抗爭策略。

由於研究者企圖了解中國大陸新聞工作者，面對官方權力的隱藏抗爭，在研究設計形成之初，便了解對於純粹使用深度訪談法，未必能夠得到問題的解答。原因之一，對於新聞工作者而言，將這些隱藏抵抗的敏感資訊揭露，恐有秋後算帳之虞¹；其次，新聞工作者對於境外研究者，可能存有部分戒心。為解決此一限制，本文發現一些中國的新聞工作者，發表文章或報告，期間談及採訪爭議性議題的案例、或者部分大陸學者，針對新聞記者的研究發現，可作為研究的重要補充。因此，決定採取兩種方法並行。

研究者嘗試突破困境，透過前南方報業集團局內人的牽線，採用滾雪球方式，成功訪問上海、廣州、北京三地的13位受訪者，其中包括8位新聞實務主管或記者（包含現任主管、卸任管理階層、曾被整肅的卸任主管、與一線新聞記者），和5位具有相關研究背景的新聞傳播學者。基於研究主題的敏感性，本文將受訪者意見作匿名處理（見表1）。

表 1：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訪談對象 (姓名筆畫序)	職稱或職業經歷	訪談時間	訪談 城市
S1	《南方都市報》新聞工作者	2009.06.18	廣州
S2	《南方周末》新聞工作者	2009.06.22	上海
S3	《南方都市報》新聞工作者	2009.06.18	廣州
S4	前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主管	2009.06.17	廣州
S5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傳播學者	2009.06.25	北京
S6	前《南方周末》新聞主管	2009.06.19	廣州
S7	前《南方周末》新聞工作者	2009.06.19	廣州
S8	《南方周末》新聞部主管	2009.06.19	廣州
S9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學者	2009.06.22	上海
S10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學者	2009.06.26	北京
S11	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學者	2009.06.26	北京
S12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者	2009.06.17	廣州
S13	《南方日報》新聞工作者	2009.06.18	廣州

貳、理論架構發展與相關文獻探討

本研究引用 Scott 在 1985 年《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和 1990 年《支配與反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兩本著作中（Scott, 1985, 1990），對於農民反抗與農民政治中權力的運作觀察，並佐以 Foucault 規訓與圓形監獄的分析，做為研究架構發展的主軸。

一、弱者的武器

Scott 的研究重點，主要不在於農民的反叛與革命，而是將注意力轉向了農民的日常反抗，包括嘲笑、諷刺、磨洋工²、開小差、裝傻賣呆、小偷小摸、暗中破壞、流言蜚語等等。這些手段，被他稱為「弱者的武器」（郇建立，2007）。

Scott 認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間，並非截然的順從或反叛的對立命題，而是在不順從與抵抗之間，有許多複雜且不同的動機與方式可以選擇。而 Horsley (2004, p. 8) 也指出，支配必然引發憤怒，而憤怒帶來抵抗。並非所有被壓迫者都擁有公開反抗的條件，如果知道公開罷工換取來的是永久性的解雇或入獄，工人會選擇怠工 (slowdown) 等方式，無論資本案採取勞動或薪資控制，工人也會產生平等的對應，如：安靜的抵抗等策略 (Scott, 1985, p. 34)。

Scott 在觀察馬來西亞農村後所提出的「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指的就是被支配者在缺乏公開的反抗環境下，只能私下採取「弱者的策略」，其反抗目的不是推翻整個壓迫性結構，而是嘗試在現有結構下，讓損失降到最低，以維持其生存條件 (Scott, 1985, p. 301)。而這些抵抗通常在小團體、個人中執行，如果是大團體，也會採取隱匿與偽裝等方式，以躲避監視 (Scott, 1990, p. 200)。

這類反抗的共同特點在於，它們幾乎不需要事先的協調或計畫、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路、通常表現為個體自助的形式、以及避免同權威發生任何直接的、象徵性的對抗。此種做法，避免了公開的集體反抗風險 (郇建立，2007)。Scott 指出，弱者的反抗，也並非微不足道，限制了許多統治者的野心，縮小了國家的政策選擇範圍，並產

生了深遠的影響 (Scott, 1985, p. 36)。

二、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

支配者從未絕對控制整個舞臺，在權力運作的網絡縫隙中仍有縫隙。從屬者與統治者的互動間，可區分出「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 Scott, 1990)。

Scott 指出，農民運動的抗拒手法，是避免公開的與權威結構產生衝突，但終究可達成抗拒的目的。他認為過去相關研究的取材，皆來自於大量的公開檔案或官方的文本 (official transcript)，官方文本中，被支配團體的表現、動機、與抗拒行動的解釋，受到主流菁英分子的影響，無法清楚地反映出被支配團體的行為，因為被支配團體往往也會隱藏其意見，使其不呈現在官方的文本或檔案中。公開文本指的是支配者與其宰制的從屬者之間的公開互動言行，如：佃農雖然會在背地裡咒罵地主，但在地主面前又必須表現得必恭必敬，所以如果只是觀察這些表現在外的公開文本，無法掌握兩者間權力運作的精髓，只有從隱藏文本觀點切入，才可以找到隱而不顯的抗拒行動 (Scott, 1990, p. 2)。

Scott 指出，權力越不平衡，則公開文本越容易接近刻板印象，他認為儘管支配者從未絕對控制整個舞臺，而且在權力運作的網絡縫隙中仍有縫隙，但是從屬者的行為，經常還是照著支配者希望的方向走。所以如果只觀察支配者與從屬者間公開文本，很容易落入霸權理論 (hegemony) 所主張，受支配者乃是受到支配意識形態洗腦，因而產生志願性的服從現象 (Scott, 1990, p. 2)。

由於 Scott 不相信公開文本是權力交鋒的全貌，所以他提出了隱藏文本的概念，他認為如果公開文本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在舞臺上的表

演，那麼隱藏文本就是發生在幕後的論述與行動，而且此部分是權力所有者，無法直接觀察到的，他認為如果要瞭解權力的運作全貌，更需要去觀察被支配者在隱蔽處的「下層政治」運作，亦即被支配者如何偽裝、如何發展、又和公開文本間有怎樣的關聯（Scott, 1990, p. 4）。

Scott 認為公開文本和隱藏文本之間，是不斷鬥爭的區域，而非一面實牆（Scott, 1990, p. 14）。不過，Scott 也提出，這並不是說公開的言行，便是虛假的，而隱密的言行才是真的，更重要的是研究兩者之間，如何互相界定、交互滲透與鬥爭的過程。

此外，Scott 曾提出「測試底限」（testing the limits）的概念，說明被支配者的容忍度到怎樣的程度？然後爲了生存，這些從屬者會按照統治者所訂下的規範，遊走在其邊緣，盡可能不去碰觸底限，他稱這樣的陽奉陰違做法，只是表面上看起來象徵性遵從，但卻很技巧地達到抗拒的目的（Scott, 1990, pp. 193-196）。

Scott 隱藏文本的概念，被認為呼應了 Goffman（1959）以戲劇的概念，解釋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爲模式，提出的台前與後台比喻。只不過，Scott 透過田野調查，提供了實務上的策略，他將其形容爲「政治偽裝的藝術」（the arts of political disguise; Scott, 1990, p. 136），將避禍偽裝分成三種方式（pp. 140-156）：（一）匿名手法（anonymity）：包括使用流言蜚語（gossip）、謠言（rumor）、匿名的威脅與暴力、匿名信、以及匿名的群眾反抗來達到反抗的目的；（二）委婉手法（euphemisms）：透過隱約的方式，來呈現修飾過後的訊息；以及（三）發牢騷（grumbling）：發牢騷的目的，往往不是簡單的個人意見表達，而是企圖去給菁英的壓力，並且保持某種程度的模糊性（a certain vagueness）。

回顧相關研究中，Scott 的「隱藏文本」與「公開文本」概念，常

被運用於從事各種文本的研究，如：聖經、法律或公聽會中文本的隱藏性（Blommaert, Bock & McCormick, 2006; Horsley, 2004; West, 2000）。該理論也被運用於針對不同族群，如：外籍配偶、空服員、澳洲大學學術工作者、外來移民，在從事日常工作時，抗爭的隱藏文本（沈倬如，2003；張貴閔，2007；Anderson, 2008; Murphy, 1998）。以及從組織傳播角度，藉由弱者的武器與隱藏文本概念，分析員工在情緒勞務中的認同、權力、隱藏文本、策略性互動等（Tracy, 2005）。眾多文獻中，相當缺乏將 Scott 理論，應用在傳媒研究的領域，只有針對電影【貧民富翁】的研究（余韜，2009），以及李小勤（2007）的新聞相關研究。

李小勤（2007），在文中曾提及 Scott「隱蔽的腳本」（hidden transcripts）和「公開的讀本」（public transcripts），但最後以「傳媒越軌」（media deviance），作為研究主旨。該研究指出，「傳媒越軌」表現在意識型態發生鬆動的非民主社會中，傳媒報導與權力中心意識形態相背離的議題，不過，這些議題通常是權力弱勢群體所關心的議題。

李小勤只針對《南方周末》對於農民工的報導與再現，做為政治話語越軌框架的研究，從傳媒對農民工報導的正面、中立、負面，指出越軌策略的方向性變化，並指出三種傳媒報導農民工新聞越軌的包裝策略：紅燈停、打土圍子、見木不見林³（李小勤，2007）。

針對 Scott 理論的應用，金光億（2008，頁 15）提醒，多數西方社會學者認為，國家與社會是對立的。但東方國家的歷史較長，老百姓具有強烈主人意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會批評國家，但是有一種情感是始終存在的，那就是「這是我的國家」，地方所尋求的是要確立自己的社會空間，並不是反對國家，所以應用上要充分考慮社會的歷史、結構、傳統等。

雖然，郭於華（2001 年 11 月 27 日）認為，底層群體的農民，面

對強大而嚴密的統治階層，對立的雙方因力量強弱過於懸殊，無從形成真正可以稱為對抗性的對立面，因而弱勢一方反抗的邏輯，就會發生扭曲和畸變。趙鼎新（2007，頁 14）也從社會運動角度認為，Scott 弱者的武器理論過於靜態，並無助於理解社會運動或革命發生的整體原因，應進一步探討如：「在什麼情況下，受壓迫群體的日常抵抗將轉為政治訴求？」等問題。

然而，本研究探討的範疇，並非一般社會運動，對於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而言，新聞管制被視為政治管制的一環，一時之間，很難發生體制上的徹底變革，因此，本文無意探討新聞界是否本質上反對國家，或者何時會產生政治訴求的行動，而是試圖借鑒 Scott 隱藏文本的抗爭策略角度，觀察長期受到政治權力控制下的中國大陸新聞工作者，如何追求新聞專業主義的表現。

三、Foucault 「規訓的權力」與圓形監獄

Foucault 希望探討的不是以往那種由上對下的傳統式高壓的壓迫統治權力，而是主張權力也是可能產生由下對上的抵抗，是一種存在於自身運作範圍內的直接生產作用。Foucault 認為應將權力放在其他權力關係的網絡中分析，他將權力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行動模式，因為權力只能在行動中存在（Foucault, 1994, p. 236；轉引自高宣揚，2004，頁 173）。而「規訓機制」和「監獄制度」，即為權力運作的方式與場域。

Foucault 指出，權力規訓有幾個特點：首先，權力不可被特定人、階級所擁有，或是被一方獨佔有，而是存在於所有社會關係中。權利是動態的、流動的，並非靜態的。其次，權力不只是壓迫性，也是生產性

的。第三，權力存在於微視面的日常生活，強調微細（capillary）分散的權力觀，反集中化（汪育如，2005，頁 21）。最後，有權力，就有抗拒。Foucault 認為，權力並不如傳統認為集中於一個中心點，而是有對抗，應該在「力」的範圍內，分析權力機制，這樣可以擺脫長久以來，迷惑政治思想界的君主，也就是「法律體系」，從力的關係內在的戰略出發，去研究權力機制（Foucault, 1978／尚衡譯，1992，頁 74-82）。

然而透過規訓，卻依然會產生反作用力，現代權力機制為消除此一潛在危險，設計了監獄制度（黃煜文，1978，頁 175）。Foucault 以英國哲學家 Jeremy Bentham 設計的「圓形監獄」為例說明，透過圓形監獄的掌控，將罪犯彼此之間作隔離，卻又能夠在同一個空間內以方便監視，透過種種曲折的通道與光學設計，被囚禁者甚至看不到監督者的影子。透過監視者與被監視者不對等的設計，不但能夠預防被監管的人有串通共謀的危險，還能避免權力來源直接遭受反抗（Foucault, 1977／劉北城、楊遠嬰譯，1992a，頁 200-201）。

Foucault 將此種環形敞視的監督系統，稱為「權力的眼睛」（Foucault, 1994；轉引高宣揚，2004，頁 198），就此產生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的現象，在此機制下，甚至連監督者（典獄長或獄卒）自己都會被觀察。監督者自己也與圓形監獄這個機構拴在一起，成為了權力運作的一個必要齒輪，而監督者也承擔起這種實施權力壓制的責任。從而把這種權力關係施加在自己身上。自己也成為了管制下最接受影響的人（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a，頁 204）。

此外對於自我產生監視效果，Foucault 也曾講述一個精神病案例，說明精神病人受到了規訓，但卻不是透過刑具，而是透過了話語，把恐懼移至管束對象的內心，使這種罪過變成秩序的一部份，使負罪感成了

瘋人自己的意識。換言之，這種罪過使得瘋人變成永遠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懲罰的對象。承認自己的客體地位，意識到自己的罪過，瘋人就會恢復對自我的意識，成爲一個自由而又負責任的主體。也就是說瘋人透過把自己變成他者的客體對象從而恢復自己的自由（Foucault, 1973／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b，頁 216-217）。

張文強（2002）從 Foucault 的權力觀出發，以封建采邑的概念研究台灣的媒體組織，認爲媒體工作者對組織與新聞專業的效忠，以及主管、老闆提供的庇護，形成一種封建式的權力關係，權力可透過各階層的管理者擴散出，達成更爲嚴密的管制。

而中國政府對於新聞業的管控，在 1978 年以前相對緊縮，主要是爲了穩固統治。改革開放以後的新聞媒體控制，在 1978 年至 1989 年，是管制相對寬鬆時期，然而八九民運發生後，對新聞媒體則採取了新的管理方式，採取更聰明、更隱蔽的措施（何清漣，2004）。在進入網際網路的資訊公開化時期，中國政府的政治控制權力在新聞事業的運作，更加複雜與細緻。而中國的新聞媒體一方面需要回應政治權力控制，但是新聞專業精神的發揮，在中國大陸的新聞業中，也正興起。

本研究認爲，Scott 的理論適用於，探討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二元主體權力交互情況，對於解釋中國傳媒組織中，存在政治權力者、媒體主管、一線記者三者間關係，與可能產生的自我監視狀況，有所不足。而 Foucault 的權力論述，則著重在分析支配者如何「馴服」？被支配者是如何「被馴服」，以及如何讓支配者無從反擊，但實際上中國大陸的傳媒環境，仍存在著下對上的抗爭情形，這種抗爭存在於媒體與國家機器、媒體與消息來源、傳媒主管與記者，各種不同權力關係中，而 Scott 的抗爭論述，正好可以補足。因此本文決定以兩者做爲研究架構的發展。

然而，權力關係的各種面向，相當多元而複雜，但是限於篇幅，本文主要聚焦在：國家機器與新聞機構間權力關係、國家機器與新聞主管間權力關係、新聞主管與一線新聞記者間權力關係、以及新聞工作者（主管與一線記者）與國家機器間的隱性抗爭。進行以下研究問題之探討：

研究問題（一）：中國大陸的國家機器，如何控制新聞媒體？

研究問題（二）：新聞媒體管理階層，在馴服抗拒之間，扮演怎樣的角色？

1. 「圓形監獄」的全景監視主義與自我監視效果，是否產生在新聞媒體的組織與管理階層中？
2. 新聞媒體管理階層，在權力運作的規訓機制與圓形監獄中，扮演何種角色？是支配者還是被支配者角色？或是雙重角色？

研究問題（三）：新聞媒體工作者，如何實踐新聞專業的抗爭策略？

1. 中國的新聞媒體工作者，其抗爭策略的「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表現與執行為何？
2. 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與支配者間，交互滲透與鬥爭的過程為何？如何測試底限？

參、國家機器對於新聞媒體的控制

本小節無意對中國新聞控制，做全面性的檢視。主要透過了解中國大陸政治體系，經由怎樣的規訓化機制與策略，對新聞體系行使控制的權力，藉以作為對新聞工作者所處環境的認識，協助讀者進入本文的研究重點。以下針對研究問題（一）分析中國大陸的國家機器，如何控制

新聞媒體。

改革開放前，媒體的報導對於政府而言，只是黨的權力在媒介中進行延伸和反應（張志安，2010）。中共中央以集權的管理方式，媒體的組織與運作由各級黨委直接掌控，媒體只要考慮政治宣傳，不用顧及經濟效益（王毓莉，2010）。改革開放後，傳播媒體得到新的改革與屬性定位。1998 年總理朱鎔基到中央電視台視察時，曾贈言：「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中國新聞網，2008 年 10 月 13 日）。新聞業順勢而變，從報導方式到社會功能認定的轉變，從文本形態到價值面，中國大陸新聞業，已與 30 年前大不相同（張志安，2010）。

中國大陸主管新聞言論的機構，由上而下為中央宣傳部至各省市宣傳部。中央管理新聞傳播較嚴謹，部分地方則較有彈性。中央級的媒體新聞，最常受到審核的控制，或是遵守中央的規定，必須規避敏感及負面的報導。像是《新華社》的內參⁴，在某種情況下，也許會決定一項黨的政策，或是一項法規要不要立法（張志安，2008，頁 50-53）。

然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對媒介的管理與規制，一開始傾向只作宏觀的原則性規定，但近年來，日益演化成越來越微觀和具體的管制，如：針對具體個別的媒介內容，進行干預。與中國形勢大好的經濟領域的改革，正好相異（胡正榮，2007 年 4 月 15 日）。受訪者（S3、S4、S7）指出，中國的傳媒面臨的管制，是隨著政局與政策而持續變動，時鬆時緊，在夾縫中求生存，並且找尋任何可能與言論空間，進行博弈的機會。

至於地方媒體的新聞控制上，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媒體」間的三角關係。而曾華國（2006，頁 225）研究也指出，由於問責制度下，地方首長希望保住烏紗帽，因此地方宣傳部長背負著，不

要出亂子的責任。爲了粉飾太平、不驚動中央，地方政府傾向控制新聞來源、對中央級媒體不友善、以及希望地方媒體不報自家省內醜聞。

受訪者指出，出事的單位就算第一時間來不及阻止記者採訪事件，但從採訪後到完稿刊登，有足夠時間讓相關單位找關係，反應到上層，因此記者從地方採訪回來後，往往禁令隨之而至（S1）。而當地方首長沒有攔截到新聞稿時，在下達禁令時，往往以紅頭文件⁵或撥電話來執行（S8）。過去常以紅頭文件下達禁令，近幾年的大都直接電話打進編輯部，且不准錄音，一方面可以不留書面證據、另一方面控制可更即時與直接（S5、S8）。

而政府對某則新聞下達的禁令，往往沒有解除的期限，媒體只能等風聲過後，再找機會報導。如下來的是指責媒體的文件，那麼報社內部有專門的委員會要負責處理寫報告（S2）。至於處置媒體的手段，有針對個人與組織。如：因報導西藏問題，《南方周末》主管遭到中宣部直接點名，必須退出第一線工作，且不能任正式職務。中宣部甚至曾經規定南周內部人員，禁止接受外媒採訪，甚至派兩名員工長期進駐報社，監管內部一舉一動（S7、S11）。

除了前述直接而明顯的新聞控制外，尚有多重規訓化的機制與策略，如透過間接迂迴的手段：使用通稿、公關施壓或說情、視線轉移、及封口費的方式，來進行新聞控制。

報導湖南嘉禾高考舞弊事件⁶中，中央政府高層領導，要求湖南省內的一切媒體，立即停止對此事件醜聞的一切正面和反面報導。全國媒體只能採用《新華社》的「通稿」，並且召回所有在湖南採訪的記者，使得《長沙晚報》記者所寫的 5,000 字稿件難以發表（孫旭培，2004）。

其次，政府直接明目張膽地使用「公關施壓或說情」的手段，來阻

礙對自己不利的負面報導消息。與我們一般認知溝通、建立形象的公關不一樣，在這裡具有粉飾太平的負面意味。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副主任莊殿軍，也有過類似「被公關」的經驗。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節目，在 2003 年播出陝西省安康市旬陽縣境內湧泉村，五天內連續三個農民連續自殺的事件調查新聞時，省委書記來電話「關切」（趙華，2008，頁 42-43）。

此外，社會普遍存在「說情風」，上海媒體《外灘畫報》對於平安保險公司進行長達半年的追蹤報導，保險公司對於該報即將進行的負面報導，希望當面向報社「溝通」，甚至提出和報社合作的可能，但都被該報社一一拒絕。最後保險公司找來相關官員向報社進行關說，仍然被拒，但最後仍因不可抗拒之因素，終究未能刊登該篇報導（耿瑛、鞠靖，2010，頁 68）。

至於「視線轉移」，此種方法是以團體採訪為名，轉移記者的注意力。2000 年，河南洛陽大火採訪的記者指出，上午八時記者接到宣傳部主動來電，說明省領導要看望家屬，並發表重要談話，請各地來的記者們，於九時整隨車出發，記者在車上不斷詢問是哪位領導要來？陪同者卻閃爍其詞。車子繞行許久，少數記者要求下車轉移採訪陣地，只剩下幾名堅持留在車上等領導出現。少數記者前往洛陽酒店，準備採訪國家安全生產專家人員時，赫然發現許多高級轎車停在門口，經查原是河南省委書記陳奎元正在 20 樓會議室，針對火災一事開內部會議。記者們才恍然大悟，宣傳部派採訪專車，是在轉移記者視線（田中初，2005，頁 216-217）。

此外，用紅包賄賂收買，或是俗稱的「封口費」，也是權力對於媒體的一種控制方式。越是富有、或與政商關係越好的媒體，在輿論監督上的表現便越弱，在商業化利益誘使下，有些記者會去領廠商紅包，或

是參加有利益性質的記者說明會，媒體們俗稱此種會議為「吹風會」（S5、S7、S11、S12）。「紅包」或「車馬費」成了新聞圈的潛規則，實際上不合法。這樣的潛規則在媒體當中也不容易被揭露，因為大部份的記者都默默認同行內不說行內的事。沒有拿封口費的記者礙於陋習，也不會去揭發其他拿了紅包的記者。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受訪者（S2、S5、S10）均提出，不同地區新聞管制鬆緊程度也有差異。廣州、上海、北京之間差異很大，此與當地發展歷史和權力結構有關。如上海是新聞重要的發祥地，同時也是1960年代文革思想發源地，所以意識形態的控制，一直都是比較緊的，以偏左的意識形態，來遮掩經濟的偏右，管制常比北京更嚴。廣東的地理位置特殊，媒體不報導，隔天香港的媒體也會報導，且當地領導人也較開明，因此新聞氛圍較開放，也因此孕育出《南方周末》，這樣批判性相對強的媒體。

然而國家機器對於新聞控制的力量雖大，如同 Foucault 所言，權力是生產性的，也就是說越多的壓制，反而往往會造成更多欲禁制的內容被陳述。透過規訓產生的反作用力，出現在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的報導類型、以及來自於網絡媒體的壓力。中國大陸對於新聞媒體，從中央和黨的控制至地方保護主義的控制，是嚴謹而且較難突破。跨地區的監督報導方式，遊走在中國政治體系的邊緣，報導其他地區既不受到控制，也能避免紅包或是廣告的利益考量誘惑。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政治體系對新聞體系控制權力的行使，對於中央級媒體採取自上而下嚴密的控制，地方媒體則在地方保護主義之下，接受來自中央與地方政府，雙重的權力控制。除了直接的新聞控制外，還包括多重規訓化的機制與策略運用。

肆、新聞媒體管理階層在馴服與抗拒之間扮演的角色 分析

以下針對研究問題（二），分析新聞媒體管理階層，在馴服抗拒之間，扮演的角色。

中國政府的權力分配，或是媒體階層的權力分配，其情況自然比環場監獄的理論假設，還要來的複雜許多。因此若以 Foucault 的理論分析媒體，應著重分析組織組成中，每一個環節的權力施展，如政府對媒體、地方領導對媒體社長、總編輯對記者等等。若政府是監督者，媒體就是犯人。如果用在媒體編採部門的話，那麼官派的新聞媒體管理階層，如：社長、總編輯，就是扮演著環場監獄中監視者的角色，而基層記者，則是被監督的犯人。

一、新聞媒體組織與管理階層中的全景敞視主義與自我監視效果

中國的新聞媒體經過長久管制下來，許多新聞工作者心中，已存在著「度」的概念（段功偉，2010；張志安，2010；黃纓杰，2010；趙華，2008）。「度」在中國媒體術語，指的也就是「紅線」、「尺度」的意思。也就是說隨著被管制經驗的增加，媒體已經很熟悉政府的議題尺度，因而不等權力前來干預，自己便會嚴守規矩。就如同 Foucault 環場監視主義論述所言，犯人知道自己正被監視，因此不敢輕易做出任何踰矩的行為。

部分受訪的管理階層（S3、S6、S7）表示，中國媒體工作者的自我

監督，確實存在，而此機制甚至是報社經營下去的必要條件。在踩到底線之前記者必須要有所拿捏，衝動的記者雖然較有衝勁，但往往分寸也拿捏得不好，此時身為媒體主管，出面說服與協調變得十分重要。

此外，媒體在選題上，也產生自我設限的偏向情況。媒體中對科學文教類的報導題材偏多，主要不是因為此議題特別重要或受市場歡迎，而是由於政治與社會議題，通常敏感性高，不好碰觸（S1、S6）。

上述管制階層的痕跡，事實上在媒體單位中似乎屢見不鮮。趙華（2008，頁 29，101）針對央視節目分析便指出，中央電視台台長楊偉光，也曾停止記者已完稿的調查性報導在【新聞調查】節目中播出。其過程是該台長預先揣摩上意，不等權力者發佈報導禁令，便從經驗上判斷播出後，應會被懲處，而自行停播，產生自我監視的效果。

透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 Foucault 所說的全景敞視主義與自我監視情況，在中國大陸媒體組織與管理階層當中，確實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媒體並不是任何時候都會順從壓迫，在以新聞專業主義為前提的情況下，有些媒體還是會有所抗拒，將於後文中說明。

二、新聞媒體管理階層扮演的角色分析

中國媒體組織內的權力布局與人員編制，比起前述監獄的分工，更加複雜。中國大陸媒體的權力者從最上層的金字塔尖端開始，往下綿密的安排各種權力的管制，如此分工不但使得管理更容易，對於報導內容的管制也更為嚴密。中國大陸媒體的內部，採取三個階層的管理機制。由上而下，依序是：主編（高階）、主任（中層），記者（基層）（肖經棟，2010，頁 78, 85）。主編與主任，則同屬於媒體中間管理者的職位。

媒體中間的管理階層，實為對上對下的雙頭角色，扮演居間的協調者。上級往往透過電話，或是各種正式、非正式的文件對媒體下達禁令。如果報導出了問題，媒體主管便需要出面對上做「檢討」（S8）。一如何清漣（2007，頁 255）在論及南方報業集團的主管任務時指出，向上級主管單位寫檢討，是《南方周末》總編輯必練的基本功。

中國大陸媒體常被要求和政府站在同一條線上去解決問題。但新聞媒體通常在挖掘新聞議題後，發現事件多為民間抵制政府的角度，一旦報導，便容易違反中央的決策，反之，如完全遵循中央決策，則引起民眾反感。此時管理者居中，一方面基於新聞專業，須讓記者繼續從事報導，另一方面又得從旁了解與釐清事件狀況，協助政府透過溝通，化解問題（S1、S3）。

但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 Foucault 所假設的環場監獄的情況，新聞媒體主管，除了身兼管理者與協調者的角色以外，在媒體這個「監獄」裡，犯人有可能跟管理者，站在同一陣線抵抗上級權力壓力。也就是說，在監獄的想像裡，管理者總是幫忙對下壓制犯人，但是在新聞媒體這個行業，新聞記者有時往往能夠取得管理者的庇護，不總是需要聽命於權力。一位受訪記者（S3）即表示，

昔日記者和編輯爭取採訪權，是一種常態，記者拿出一個麻煩的稿子，編輯愛死了，因為你是行使了報社的權力和義務，因此當你受到一些處罰時，大家都能理解，但不會因此讓你丟了工作…

在中國媒體組織的環境裡面，管理者確實難為。受訪者以《南方周末》歷任總編輯舉例，新聞主管本身的信念與態度，影響著其站在官方、或是站在一線記者多一點（S8）。在不同的領導風格下，記者所能發揮的舞台，也會有所變化。

一位曾擔任《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新聞部主管的受訪者認

爲，他會要求第一線的記者不要自我審查，因爲後面的審查已經夠多了，這不該是第一線記者要管的事，往上更高層，自然有人會做處理或對外解釋的動作（S6）。因此，在受到長官庇護的前提下，受訪記者（S13）便表示，之前曾經採訪某銀行行長打人的事件，行長威脅要打給市領導，該記者與編輯討論後，還是決定先發稿出去，他認爲南方集團的報社，還是比較有理想性，批評下來時，只要不是重大失實問題，來自內部壓力不大。

《南方都市報》報導孫志剛⁷在獄中被霸凌致死的事件，激起了中國大陸輿論的譁然，最後導致國家廢除了收容制度，廣東政府領導也因此被認爲有缺失。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前社長范以錦，在此一事件的處理方式，則偏向保護記者，對上級做出抵抗。受訪主管（S8）說，南方集團是依照逐一題材與政府進行博弈，透過控制情緒與發揮理性，想辦法將報導拉回新聞本位。

綜合上述，新聞媒體的中間階層主管，實擔負著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雙重任務。如果報導出了問題，除了幫忙上級管制下屬，有時還要原則性地保護下級，幫忙對上抗爭，才不會使得下屬心生不滿，影響到媒體的運作。然而不論是面對從上而來壓制的力量，還是面對從下升起的反抗力量，中間者都首當其衝。《南方周末》因時常牴觸政府禁令，編輯主管屢次遭政府撤換。有些新管理者上任後，無法獲得底下員工認同，此時記者會採取較爲抗拒的態度（S8），在管理者沒有充分取得協調的情況下，《南方周末》便爆發過大批記者的出走潮，此事件看在許多資深記者眼裡，依然覺得殊爲惋惜（S2）。

至於在新聞媒體管理階層馴服、抗爭策略的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方面，由於新聞媒體管理階層，面臨對上（國家機器）、對下（基層新聞工作者）的雙重角色，因此，在雙頭角色上，都有馴服與抗爭的作爲。

在媒體工作者的行爲與新聞文本的呈現上，所謂公開文本和隱藏文本，實爲一體兩面的存在關係，公開文本背後，隱藏了行爲者想要表達的隱藏文本。

當新聞媒體管理階層扮演被支配者角色時，其實是跟第一線新聞工作者站在同一陣線，做出抗爭策略，與基層記者站在同一戰線，使用隱藏文本的手段，來達到抗拒的目的（詳見第五部分分析）。

伍、新聞媒體工作者實踐新聞專業的馴服與抗爭策略分析

處於第一線新聞媒體工作者，看似在權力生物鏈的最末端，必須向支配者馴服，然而在新聞實務的運作上，也不難發現第一線的記者，或者單打獨鬥，或者與媒體主管共謀，出現對國家機器抗爭的行爲。以下針對研究問題（三）：分析中國的新聞媒體工作者，其馴服、抗爭策略的「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表現，以及其與支配者間，交互滲透與鬥爭的過程。

一、新聞工作者抗爭策略的「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分析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向是中國社會各個領域規避、軟化、抵抗上級政令的有效方式。新聞記者面對權力支配時，往往主動適應，透過臨場發揮或報導資源，來達到抗拒的目的，而非一味的退讓（田中初，2005）。

新聞工作者往往在從事抗爭策略時，公開表現的是接近馴服的公開文本，而其骨子裡所隱含的，是具有抗拒意涵的隱藏文本。在此本文以

隱藏文本的分析架構為依據，匯整出一套屬於中國大陸媒體工作者的避禍抗拒策略，分別為：「時空轉換策略」、「責任轉移策略」、「報導事實策略」、「合縱連橫策略」「反客為主策略」、及「鑽研漏洞策略」六種策略。並將每個策略的實施方法，分析如下：

（一）時空轉換策略

中國大陸對新聞的管制，呈現時鬆時嚴的狀況。時空轉換意指，運用採訪與刊登報導的時間與空間策略，來突破新聞控制的限制。

1. 等待時機法

各種國內外的重大事件，都會影響到當時中國有關單位，對於新聞管制的鬆緊程度，例如奧運時期外國媒體增多，所以管制相對開放。但待奧運結束後，正好遇上世界金融風暴，局勢不平靜，所以又再管制，待平靜後又會再開放。故針對某些重大新聞，以南方報業集團為例，即使禁令已經發下來，通常還是會要求記者把採訪作完，先儲存起來，等待中央級的媒體發佈，再趕緊跟進，或是等到禁令較鬆時，再將報導發出，上述種種進退的考量與作法，皆是為了避免冒險衝撞（S2、S4、S6、S13）。另外肖經棟（2010，頁 121）也指出，《江南都市報》新聞部主任張寧，在《南昌晚報》任職時，針對南昌淹水問題，有系列監督報導的想法。但由於涉及南昌政府相關主管部門的批評，因此他先暫時擱置調查好的報導，後來轉至隸屬於江西省的《江南都市報》任職時，便可以不受南昌政府的管制，將先前想法付諸實行。

2. 見縫插針法

有時記者報導被禁令牽制住，但一旦情勢改變，便能把握時機，將許多不能被報導的訊息，偷渡進報導裡面。如《21 世紀經濟報導》資

深記者左志堅（2010，頁 226）指出，該報曾經想報導上海市官員貪污腐敗的相關案例，但當局嚴令不准報導，於是他們便將稿件暫且按住不發。幾天後，因別的案子，上海市委辦公廳主任孫路遭到司法判決，便趕緊趁著寫孫案的時候，將本來不敢報導的消息，通通隱晦地寫了進去，成功偷渡了本來被禁止的案例。

3. 減少權力反應的時間

到現場進行實際採訪需要充分時間，但在中國大陸，往往記者到當地採訪之前，就已經被上層權力單位知道，接著該單位便會要求報社召回記者，禁令馬上跟著下來。因此減少權力反應的時間，也成了記者順利報導的一種手法。

過去任職於南方報業集團高層主管便表示，一些禁令或重大事件，媒體可以搶在有關部門通知或禁令到達之前，把報導發佈出去。如檢察院的案子後續，可能會送到法院，但通常法院的案子，都會規定要等到審判結束後，才可以進行報導，記者就會利用開庭前空檔，把報導刊發出去。這種媒體操作面的技巧，在平面、電子與網際網路媒體都適用（S2、S13）。

值得注意的是，網路的興起，似乎更有助於抑制權力反應。有些引用網路消息的報紙，當天採訪，當天出稿，報導速度迅速，報導往往在官員還不知情時，便已刊登出來（S1、S2、S3）。

4. 版面乾坤挪移法

媒體編輯有一種隱藏文本的編輯手法，即利用報紙各個版面不同空間，把會被政府盯上的重要新聞，排在報紙不起眼的地方。受訪者當中一報紙主管，便提到觀察中國報紙的時候，不要只考察頭版頭條，因為頭版的內容，往往都是跟政治妥協過後的產物，有時反而是監督力度最

弱的文章（S2、S8）。

《南方日報》記者段功偉（2010，頁 139），在〈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體？〉的報導當中，便採用正反雙方的說詞，把與官方口徑不同的報導，放在較不起眼的第三版，以免讓官方或外界指責是「添亂」或「幫倒忙」。最後世界衛生組織公布，果然他們放在第三版的報導說法才是正確的。這便是善用了一些「隱藏」的技巧，使得報導得以發聲。

陸擘（2003）研究指出，另一種抗拒策略，則是新聞媒體管理階層，將集團內媒體做「任務性」區隔，形成「母報對上，子報對下」；或者在同一份報紙上把版面分割，一部分版面對上，另一部分版面對一般民眾。達到所謂的「兩老滿意」，此種變通方式，既不冒任何抗拒宣傳管理的風險，完成自上而下的宣傳任務，又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媒介自身的利益。

（二）責任轉移策略

為避免自身或引述的消息來源，被秋後算帳，中國大陸新聞工作者轉移自身責任，以規避責罰的方法，便應運而生。

1. 隱匿消息來源法

受訪者（S1、S10）指出為使自身不受到權力的報復，記者將有爭議的新聞來源隱匿。如中宣部公佈禁令，不允許轉載《南方都市報》網路報導，其他媒體若欲轉載，勢必會面臨風險。然而南方報系內的小媒體，可引用《南方都市報》作為消息來源，而其他媒體就可以引用小媒體作為消息來源，如此最後媒體在引用消息來源上，便不會出現《南方都市報》關鍵字眼，藉以模糊原始消息來源。

有時權力單位規定，實體媒體不得被轉載時，如《南方周末》會將

消息放在南方報系的網路上，此時其他媒體要轉載《南方周末》的報導，就可以改以轉自網路的名義，而不違反規定（S13）。此外曾任職南方報業集團的受訪者（S7）指出，報社一開始在文章上為編輯者掛名，但此制度後來取消，有時也模糊化報導的時間、地點，目的是為了保護採訪記者。

2. 轉換消息來源法

將消息來源轉換他處，使得自己不會成為第一的帶頭揭露報導的媒體，自然也能避免遭到究責。通常受管制相對不嚴的媒體，也就容易收到其他消息來源所提供的報導題材。如有一件新聞《新華社》記者早已知悉，但礙於政治崗位不便報導，此時便可以私下將消息來源分享給當地媒體，等當地媒體一報，《新華社》便可跟進報導，且不用冒政治上的風險，因為這時，報導的不是他們，他們「只不過是跟著報」罷了（S1、S5）。

另外，網際網路的興起，也提供了新的博奕籌碼給傳統媒體。《南方都市報》的「網眼版」，若某件事涉敏感，可能無法報導，記者編輯可能會自己上網站發帖，引發討論後，再以網路熱帖的名義來報導，其實很多案例都是記者自己做的（S9）。這就是利用事實不可以報導，但謠言可以報導的漏洞，將消息來源順利轉換成不好攻擊的目標，順利躲過受罰（S5）。

（三）報導事實策略

1. 強調新聞事實法

涉及批評性報導時，報導過程必須將各個新聞訊息進行平衡客觀的梳理，以確保事後官方追究時，能提出有利的報導事證來保護自己

(S2、S10、S12、S13)。也因此，像經常被官方盯上的南方報業，內部就規定，報導不能再用「據記者瞭解」等類似的模糊字眼，必須把資訊源交代清楚，以此來規避一些事後審查的風險(S2、S13)。「可以有不說的真話，但決不說假話」成了《南方周末》的一句經營口號。如此一來，有關部門就算想要打壓，也不知從何下手。

其中從事新聞編輯工作的受訪者也表示，只要把事實報導出來，不一定要站在哪一邊，而且政府官員也抓不到你的把柄。如報導某人因為某事被抓了，卻絕不談他被抓對不對。只說政府準備推什麼政策，但絕不論政府推這個對不對。其實閱聽眾都是聰明的，只要媒體把訊息播報出來，不用媒體去表達立場，他們就能知道(S1、S6)。

2. 春秋筆法

春秋筆法，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的生存本事。古代因為不能直接得罪皇帝，因此就算不贊同，寫文章時也得包裝一點東西，如此透過較隱晦的方式，進行打游擊、曲裡改旁、指桑罵槐。在特地的背景下，就是能讓人看得懂，甚至讓官方理解是一套，但民眾的理解又是另外一套(S2、S6)。

發展特殊的寫作體例風格，以撰寫故事夾敘夾議的報導陳述方式進行，被《南方周末》主管稱為「南周的話語系統」。是刻意形成的一種風格，並形成共識，對於一些可能比較敏感的事件，使用比較隱晦的話語來包裝，對於禁止說的話，採取打游擊的春秋筆法，實行隱藏式文本(S6)。

另外，針對某些事件，官方常規定要報導就只能使用《新華社》通稿。有些媒體便會改採用寫社論的方式，在內容中夾敘夾議，或導入感性訴求的故事，藉此弱化文章的批評力度(S3)。

(四) 合縱連橫策略

在中國新聞界，有時候獨家反而是危險的。因為目標容易遭到權力的集中攻擊。面對难度大、爭議性高的新聞題材，有賴一些外部策略，才能達成報導的目的。地方媒體編輯常需要對照參考中央級媒體的報導議題，以避免內容特立獨行被官方盯上，此動作被稱為「對版面」（S10），這和其他國家媒體「搶獨家」的思維，非常不一樣（S2、S6、S13）。

1. 民粹法

利用廣大的民意，迫使主管單位屈服，在中國已成了一種越來越有效的辦法。像是遼寧省西豐縣，因為記者報導一篇題為「遼寧西豐：一場官民較量」的新聞，而派警察來抓記者。當事人下台後，七、八月又在其他單位偷偷上台，網民發現後，窮追猛打，搞得該書記又被迫下臺，該單位被迫表示官員任命是有問題的（S5）。

受訪的媒體主管（S1、S2、S4）樂觀的認為，輿論環境不管多艱難，民意興起，一定就會開放。其中，網路扮演尤其關鍵的角色，網路發達的地方也比較容易出新聞。由於網路沒有邊境，對中國輿論監督非常強大，強大在民間的輿論、新媒體的輿論和傳統媒介的輿論，形成一種「合力」現象、強大輿論。即指，老百姓有意見—上網發佈—形成民意、輿論—然後傳統媒體編輯報導。如此利用民眾的力量，讓權力者對於新聞報導，必須做出一些讓步。

2. 合作突圍法

中國大陸雖然缺乏有影響力的記者組織，但是小範圍的記者組織還是存在，時間一久大家彼此之間相互熟悉，自然會形成鬆散的記者群體。而這種記者群的內部訊息溝通比較順暢，一旦碰到重大事件，往往

也會聯合其餘媒體相互討論，尤其是批評報導，記者聯合起來做，以此來降低風險（S8、S13）。

媒體之間雖不連繫，但勾結，並保持良性的互動。由於中國大陸媒體有地區的差別，不同媒體管制的鬆緊程度不一，有時候是與國外媒體合作，有時是與中央級媒體合作，如果中央媒體監視的緊而不能報，就送到廣東等相對開放的媒體去報導。如果還是被管制，就在送到網路上去報導，只要讓新聞上了談論平台，就有機會成爲全國性大新聞，給了官方壓力（S1、S5、S8）。

《南方周末》在媒體陣線之中，便時常獲得其他媒體不敢報導的消息，等《南方周末》一報導，其他媒體便以盟友之姿紛紛跟進，形成更大的報導力量（S8）。這樣的方式有合作也有競爭，但是至少在禁令頒布以後，如能利用這些彼此合作的方式進行突破，對於報導策略而言也是相當有效的（S2）。

（五）反客為主策略

中國大陸媒體的特殊環境，使得媒體產業落在許多權力的階級之中。有時記者往往會利用這些階級，來對自己上一級的管理者進行突破。而藉由這種方式，能讓媒體由被動的狀態直接轉爲主動，進而掌握到控制權，往往讓被壓制的相關單位有如啞巴吃黃連。是以漸進的方式進行，一有機會立刻把握住，進而掌握主導權，其實際意義與喧賓奪主相同。

有的記者，會主動將事件送交到上一級的政府進行審查。或是訪問上一級的政府，以上司來當做靠山，讓低層涉弊單位較不敢有所異議（S1、S2）。就像是記者想要批評江蘇某一學校，便可以先將報導給江蘇省教育廳看，然後直接去採訪，這樣就可以說是政府經過採訪許可

的，要求對方配合採訪（田中初，2005，頁 237）。

（六）鑽研漏洞策略

中國大陸沒有成文的《新聞法》，各種管制報導的禁令沒有具體法規條文可尋，記者便有了許多找漏縫鑽的機會（S10）。例如官方禁令規定：事實不可以報導，那謠言並未禁止報導。因此有些記者便以猜測性的報導方式，同樣把事實勾勒出來（S4）。

事實上，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的作法，便是記者利用漏洞所鑽研出的突破報導方式。地方政府對媒體監督本地政府有嚴格的管制，但卻未說不能去監督別地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眼看媒體不是監督自身，因此就睜隻眼閉隻眼，媒體因此又成功地創造出額外的報導空間（S5）。

綜合上述，可發現記者能夠避免被權力打壓的方法有相當多，這也是中國大陸特殊的體制下，所產生的媒體獨特現象。其中記者的反抗行爲，可以是個人的、也會運用集體行動的合縱連橫，相互形成鬆散的記者聯盟，彼此合作達成報導目的。跟其他國家的新聞媒體比較，這些策略顯得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且可以確定的是，中國大陸媒體這樣的抗拒發展還會持續的改進，尤其是網路的高速發展，更使得抗爭策略的發展，帶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快速的變化，值得我們持續研究與觀察。

二、新聞工作者與支配者間的抗爭分析

在中國政府對新聞的管制下，中國媒體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在報導重大、或較敏感的議題之前，必須要先經過主管單位的審核，或是向上級「請示」。對於大部分記者都懂得，報導前應該要清楚底限在哪

裡，勤於向上級「請示」，才不容易誤踩紅線（肖經棟，2010，頁 4）。尤其是越靠近中央，且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媒體，越是需要請示，播出前的送審，更是自保的最好手段。

媒體未經請示踩線後，所遭遇到權力的懲處的案例為，2005 年河南汝州市發生一起煤礦事故，當時《河南商報》的記者范友峰發現了這個消息，便兩度前往當地進行採訪，總編輯馬雲龍看了記者的寫稿以後，下定決心要揭發，交代記者要留下證據，以便將來打官司用。但儘管媒體備有錄影錄音等證據記錄，最後報導發出後，《河南商報》還是被停刊整頓一個月，理由是「報導嚴重損害中國新聞界的形像」，馬雲龍也被勒令解聘（張志安、黃纓杰，2010，頁 177-178）。

《南方周末》便是清楚知道輿論監督的底限在哪，才能在改革中求生存（肖經棟，2010，頁 115）。《南方周末》執行總編輯向熹，形容南周的生存狀態為，在市場上獲得廣泛影響的同時，卻屢屢出現危機。而前社長范以錦總結其經營心得指出，中國辦報的基本規則必須遵守，要注意新聞的規律，也要注意國情。所以《南方周末》是在兩者之間調節，底線要自己拿捏。如果不注意國情盲目衝撞，最後便無法生存。但是如果凡事不及時報導，該告訴民眾的不說，那麼報紙同樣會走向滅亡（范以錦，2006，頁 54）。由此可看出，媒體在中國經營時，如何在市場與政治之間做好策略上的拿捏，並掌握底線，成了生存所必須的熟知的藝術。

測試底限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媒體看重的不只是當下節目可不可以播出，還更看重以後這種報導路線能不能走下去。當時央視【新聞調查】節目，其中一集因評審沒過，而後續的製作與播出顯得格外艱辛。反之如果測試成功，那麼以後可以播出的路線變寬廣的多，就等於是把限制的窄門縫又撐大了一點（趙華，2008，頁 50）。

因此，爲了要最大可能的拓展新聞的模糊邊界，各種抗爭手法，其實是媒體轉型生存的必要手段。新聞改革雖然有明確的邊線，但政府的新聞禁令是具體的，一旦實際應用在新聞實務上，還是無法將各種複雜的實際情況窮盡，這時在安全區與禁區之間，就會出現灰色地帶。媒體必須善用一些之前描述過的「邊緣突破」、「打擦邊球」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底限」和「技巧」，來不斷的測試如何找到最佳的平衡點（張志安，2010）。

而對於具有衝勁的記者來說，灰色地帶是新聞實現主動性、開拓性、創新性的最好時機。每一次在灰色地帶的衝擊，都有可能把危險的東西轉化爲合法和安全的事情，進而逐漸縮小禁區，使之成爲事實而讓大家接受與習慣（田中初，2005，頁 224）。如針對「不准報導」、「暫不報導」、「謹慎報導」、「不要炒作」、「以發通稿爲準」、「按通發稿發表」等不同的說法，記者就可以有不同的發揮空間。這是根據長久以來的新聞實務經驗，所判斷出來的策略（田中初，2005，頁 234）。

在這樣的測試與打擦邊球的抗爭中，媒體一些測試底限的「創意」便很常見。例如 80 年代初期，廣東《羊城晚報》復刊不久，發生了一起船難意外，死了兩百多人。有關單位馬上封鎖消息，要求媒體不許發表死亡人數。當時《羊城晚報》吳姓總編輯，便將記者調查到的資料，整理以後發表見報。有人問他爲何不發表死亡人數？他回答：「不，我只發表生還人數。」此例便是記者鑽過禁令上的漏洞，將想要發表的訊息發佈出去的案例（田中初，2005，頁 235）。

陸、結論與討論

中國大陸政治體系對新聞體系控制權力的行使，對中央級媒體採取自上而下嚴密的控制，地方媒體則在地方保護主義之下，接受來自中央與地方政府，雙重的權力控制。除了直接的新聞控制外，多重規訓化的機制與策略還包括：使用通稿、公關施壓或說情、視線轉移、及封口費的方式，也被用來進行新聞控制。

本研究發現，Foucault 所說的全景敞視主義，在中國大陸新聞組織與主管機構中，確實存在，接近圓形監獄的機制，存在於新聞媒體體制，其中，政府扮演監督者，媒體管理階層，如同獄卒，而第一線新聞記者就像是犯人。

然而，媒體並不是任何時候都會順從壓迫。新聞媒體管理階層，同時扮演著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雙重角色，採用公開文本，表示對上馴服，另一方面，也透過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對下展開馴服管理措施。至於其抗爭策略，則常基於避禍或庇護記者，選擇與記者站在同一戰線，運用類似排版技巧或版面區隔等「隱藏文本」的手段，達成目的。

新聞工作者的抗爭策略與隱藏文本的執行方式表現在，「時空轉換策略」、「責任轉移策略」、「報導事實策略」、「合縱連橫策略」、「反客為主策略」及「鑽研漏洞策略」上。且可發現，記者的反抗行為，可以是個人的、也會運用集體行動的合縱連橫，相互形成鬆散的記者聯盟，彼此合作達成報導目的。

李小勤（2007）指出，傳媒的越軌對組織而言，並非衝紅線、有意識的地對立，其本意是推動正當的爭議，甚至是對核心意識形態的維護。但因為核心意識型態張力與衝突，多在幕後，是統治階層隱蔽的腳

本，需要傳媒的推測揣摩，所以傳媒的弦外之音，往往會碰觸到某些敏感地帶，嘎然而止。

然而，本研究顯示，即便在新聞控制嚴苛的中國，對於權力抵抗的隱藏作為，確實存在於新聞實務界。在中國的新聞體制，未能從事根本的制度變革之前，本文無意探討這樣的抗拒策略，最終將導致怎樣的結果，因為權力端終究擁有中國新聞傳媒的生殺大權。過去中國大陸新聞的相關研究，重視分析公開文本，忽略了 Scott 所說的權力研究的死角，本文價值在於觀照新聞工作者隱藏文本的反抗策略，企圖勾勒出新聞控制權力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整體而言，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與支配者間的交互滲透與鬥爭，是相當激烈的，通過一次次的衝撞與測試底限，其目的雖然不是為了創造一個全新的體制，而是期望透過每次與支配者的交鋒，在嚴密的新聞控制下，拓展新聞專業表現的空間。

此外，中國大陸目前對於新聞媒介的新聞控制，已經避免赤裸裸公開行刑式的強制性作為，而是採取各種不同的干預與施壓手段，規避社會各方與國際社會的譴責。在一個尚不具備充分新聞採訪權的中國大陸新聞界，更是需要運用本文所提的隱藏文本抗爭策略，為採訪與報導爭取更多的新聞專業空間。

學者曾針對台灣報社研究指出，媒體配合新聞工作者對組織與新聞專業的效忠，形成一種封建式權力關係，因而他主張發展新形式的迂迴策略回應新聞工作自主（張文強，2002）。本文呼應這樣的觀點，並建議中國大陸的新聞工作者應持續採取隱藏文本策略，為推進新聞自由空間而努力。此外，中國大陸的新聞專業教育中，則需要多傳授隱藏文本抗拒的技巧，讓新聞界的生力軍未來投入實務界，藉以在中共政治權力控制下，盡可能地發揮新聞專業主義精神。

註釋

- 1 研究者赴中國大陸田野調查時，南方報業集團內部人員表示，2009 年為「兩南年」，中央對於南方報業集團的兩份報業，控制得相對嚴厲，而部分南方報業集團主管與一線記者，也都相對噤聲。
- 2 磨洋工，意指在一定時間內可完成的工作，但是採取怠工方式，慢慢做。
- 3 紅燈停：見到紅燈才停，任何其他時候都往前衝；打土圍子：在權力壓力較大時，權力弱勢選擇讓權力中心可忍受、又具典型意義的「小土圍子」攻破；見木不見林：規避風險的方式，讓案例說話，做到不顛覆制度、不對抗政府、不做整體的否定。
- 4 內參，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華社內部（不公開）發行的機密文件，是中共高層重要的政治信息文件之一。其內容包括與政治有關的核心內容，如領導人有關政治的態度和決策方向等。
- 5 不同於立法規定的法律、法規、規章的公佈於報刊媒體的發佈方式，而是在權力機關和有關機關及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內部層層傳達。文件的結尾都會有傳達到哪一級的要求，比如省軍級、縣團級等，有的還有密級要求，如加註絕密、機密、保密，因其上部的標題為紅色，人們習慣稱之為「紅頭文件」。
- 6 2000 年 07 月 13 日，湖南嘉禾高考產生舞弊事事件，造成嚴重的後果，致使該考點 510 名考生中的 203 名考生，被省教育廳招生考試中心取消高考資格，77 名考生相關科目作零分處理，嘉禾縣各類教育全國統一考試考點資格被取消。
- 7 孫志剛事件發生於 2003 年，指的是原籍湖北黃岡的孫志剛被廣州市政府執法機關以三無人員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間被收容所員工毆打身亡的事件。此事件雖經官方聲稱為收容所員工犯罪的個案，卻引發了中國國內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

參考書目

- 中國新聞網（2008 年 10 月 13 日）。〈「清正廉明」「不做假帳」：朱鎔基四次破例題詞〉。取自「湖南紅網」<http://gaige.rednet.cn/c/2008/08/18/1576167.htm>
- 方可成譯（2009 年 8 月 1 日）。〈胡舒立：中國最危險的女人〉，《絕版青春—方可成的博客》。上網日期：2009 年 9 月 12 日，取自

- <http://www.fangkc.cn/2009/08/page/3/> (原文 Osnos, E. [2009, July 20]. The forbidden zone. *New Yorker*. New York, NY: New Yorker Publishers.)
- 王毓莉 (2009)。〈中國大陸《南方周末》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報導之研究〉，《新聞學研究》，100: 137-187。
- 王毓莉 (2010)。《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自由：一個新聞輿論監督的考察》。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左志堅 (2010)。〈《21 世紀經濟報導》：調查如何徹底〉，張志安 (主編)，《潛入深海—深度報導幕後三十年的深度軌跡》，頁 220-230。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 田中初 (2005)。《新聞實踐與政治控制：以當代中國災難新聞為視閥》。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余韜 (2009)。〈弱者的武器 《貧民富翁》中的敘事時空與內容分析〉，《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 9-103。
- 何清漣 (2004)。〈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 “中國人權研究報告”〉，《何清漣文集》。上網日期：2008 年 12 月 17 日，取自「百家爭鳴」
http://www.boxun.com/hero/heql/35_1.shtml
- 何清漣 (2007)。《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
- 李猛 (1999)。〈福柯與權力分析的新嘗試〉，《社會學理論學報》，2(2): 375-413。
- 李小勤 (2007)。〈傳媒越軌的替代性框架：以《南方周末》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2: 133-160。
- 汪育如 (2005)。《免不了的一刀—台灣產婦的社會建構》。東吳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沈偉如 (2003)。《天堂之梯？—台越跨國商品化婚姻中的權力與抵抗》。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沈業川 (2010)。〈社會記錄：一個異類央視節目的五年史〉，張志安 (主編)，《潛入深海—深度報導幕後三十年的深度軌跡》，頁 40-57。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 肖經棟 (2010)。《記者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尚衡 譯 (1992)。《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台北：九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原書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The will to knowledge*.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 武婧 (2006)。〈從「小心中毒」到「放心食用」——《每週質量報告》2004 年變調分析〉，展江、白貴 (編)《中國輿論監督年度報告 2003-2004》(下冊)，頁 852-86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金光億 (2008)。〈民俗文化的構建與國家—社會關係——以韓國江陵端午祭為例〉，《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學術通訊》，4: 11-15。
- 姜紅、許超眾 (2008)。〈從「鬥士」到「智者」：輿論監督的話語轉型——新世紀以來《南方周末》文本分析〉，《新聞與傳播評論》，7。取自 http://journal.whu.edu.cn/research/read_research.php?id=1107
- 段功偉 (2010)。《經略藍海——一位時政記者的職業行思》。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 胡正榮 (2007 年 4 月 15 日)。〈媒介怎麼了？我們怎麼辦？〉。取自「中華傳媒網」<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546>
- 范以錦 (2006)。《南方報業戰略——解密中國一流報業傳媒集團》。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 郇建立 (2007)。〈「弱者的武器」及其意義〉，《二十一世紀》，6 月號。取自「烏有之鄉 UTOPIA」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707/21050.html>
- 孫旭培 (2001 年 12 月 18 日)。〈如何看待「跨地區監督」？——以廣東報紙的三篇監督性報導為例〉。取自「中華傳媒網」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611>
- 孫旭培 (2004)。《當代中國新聞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
- 耿瑛、鞠靖 (2010)。〈外灘畫報：深度報導的另類探索〉，張志安 (主編)，《潛入深海——深度報導幕後三十年的深度軌跡》，頁 67-82。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 高菲 (2006)。〈敘事學視野下的《每週質量報告》〉，展江、白貴 (編)，《中國輿論監督年度報告 2003-2004》(下冊)，頁 843-85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高宣揚 (2004)。《傳科的生存美學——西方思想的起點與終點》。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張文強 (2002)。〈媒介組織內部權力運作與新聞工作自主：封建采邑內的權力控制與反抗〉，《新聞學研究》，73: 29-61。
- 張志安 (2008)。〈深度報導從業者的職業意識特徵研究〉，《現代傳播》，5: 50-53。
- 張志安 (2010)。〈導言——深度報導 30 年：軌跡回望與專業反思〉，張志安 (主編)，《潛入深海——深度報導幕後三十年的深度軌跡》，頁 3-22。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 張志安、黃纓杰 (2010)。〈報人馬雲龍的新聞口述史〉，張志安 (主編)，《潛入深海——深度報導幕後三十年的深度軌跡》，頁 167-178。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 張貴閔（2007）。《國家、移民、身體：中國城市外來人口生育政治》。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裕亮（2005）。〈從黨國化到集團化—大陸報業結構變革分析〉，《東亞研究》，36(1): 49-104。
- 連雋偉（2009年11月10日）。〈談判破裂 《財經》胡舒立辭職〉，《中國時報》。上網日期：2009年11月10日，取自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501833+112009111000247,00.html>
- 陸曄（2003）。〈權力與新聞生產過程〉，《二十一世紀》，77: 18-26。
- 陸曄、潘忠黨（2002）。〈成名的想像：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新聞學研究》，71: 17-59。
- 郭於華（2001年11月27日）。〈“弱者的武器”與“隱藏的文本”——研究農民反抗的底層視角〉。取自「學術中華網」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1126>
- 陳懷林、陳韜文（1998）。〈烏籠裏的中國新聞自由〉，何舟、陳懷林（編），《中國傳媒新論》，頁 50-65。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司。
- 喬雲霞、胡連利、王俊傑（2002年10月18日）。〈中國新聞輿論監督現狀調查分析〉。上網日期：2003年4月2日，取自「中華傳媒網」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xsqk_view.jsp?id=1114
- 曾華國（2006）。《中國式調查報導》。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 黃煜文（1978）。《傳科的思維取向—另類的歷史書寫》。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黃纓杰（2010）。〈在細雨中呼喊：《新週報》的短暫歷程〉，張志安（主編），《潛入深海—深度報導幕後三十年的深度軌跡》，頁 23-39。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 趙華（2008）。《央視新聞調查幕後解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趙鼎新（2007）。《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更新與中國經驗》。台北：巨流出版社。
- 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a）。《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原書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 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b）。《瘋癲與文明》，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原書 Foucault, M. [1973].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賴祥蔚（2002）。〈國共政權控制報紙的政治經濟比較〉，《新聞學研究》，73: 133-165。

- Anderson, G. (2008). Mapping academic resistance in the managerial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15*(2), 251-270.
- Blommaert, J., Bock, M., & McCormick, K. (2006). Narrative inequality in the TRC hearings: On the hearability of hidden transcript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5*(1), 37-70.
- Chan, J. (1995). Calling the tune without paying the piper: The reassertion of media controls in China. In C.-K. Lo & M. Brosseau (Eds.), *China Review 1995* (pp. 5, 1-5, 16). Hong Kong, China: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 (1973).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R. Howard Trans.).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1)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The will to knowledge*. (R. Hurley, Trans.). London, UK: Pengu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6)
- Foucault, M. (1994).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 Vol. I-IV*. Paris, France: Gallimard.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N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 Horsley, R. A. (2004). Introduction—Jesus, Paul,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Leaves from the notebook of James C. Scott. In R. A. Horsley (Ed.), *Hidden transcripts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Applying the work of James C. Scott to Jesus and Paul* (pp. 1-28). Leiden,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
- Murdock, G. (1982).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In M. Gurevitch, T. Bennert, J. Curran, & J. Woollacott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pp. 118-150). London, UK: Methuen.
- Murphy, A. G. (1998). Hidden transcripts of flight attendant resistance.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1*(4), 499-535.
- Scott, J.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the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 C.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racy, S. J. (2005). Locking up emotion: Moving beyond dissonance for understanding emotion labor discomfort.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2*(3), 261-283.
- West, I. (2000). Debbie Mayne’s trans/scripts: Performative repertoires in law and everyday life.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5*(3), 245-263.

Taming v.s. Resistance: The resistance strategies of media professionalism for Chinese government political power

Yu-Li Wang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taming and resistance strategies of news production against news control in mainland China's media. By taking the hidden transcript analysis by James C. Scott and the power analysis by Michel Foucault, the study developed the theoretical frame and raised research questions. The research employed the "in-depth interview" and "literature review" as its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echanism of panopticon seems to exist in the Chinese news organization.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newsroom plays the dual roles, which are the dominator and the dominated one at the same time. The journalists use the "hidden transcript", which includes time and space conversion, shift of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 the facts, media cooperation, report to the higher government level, and looking for loopholes as resistance strategies to fight for professionalism.

Keywords: media professionalism, political power,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

* Yu-Li Wa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一〇期 2012 年 1 月